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和平与民主社会呼吁》到库尔德工人党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已完成的清算进程、战 略瓦解与意识形态投降

库尔德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及阿卜杜拉·奥贾兰的《和平与民主社会呼吁》，不应仅被视为战术转向或组织重组，而是意识形态取向质变的具体体现。这种取向标志着一种对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革命性质和根植于民族自决权的政治独立战略的蓄意背离；相反，它试图通过意识形态重建实现对现有体系的融入。诸如“民主民族”、“共同祖国”、“道德政治社会”、“民主邦联主义”及“无国家解决方案”等术语，乍看似乎是现有统治模式的替代方案，实则植根于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该思潮摒弃革命战略、阶级斗争、被

压迫者武装抵抗的权利以及民族独立斗争，从而为针对被压迫民族真正的解放斗争的取消战略奠定意识形态基础。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及配套宣言将库尔德民族自二十世纪以来的反殖民斗争的正当性污蔑为"暴力升级"，将武装抵抗贬为"旧范式的包袱"，并宣称新时代必须通过"民主、道德与和平的解决方案"来塑造。然而这种立场否定了库尔德民族历史上在四大区域对民族国家殖民法西斯式占领的集体抗争。将民族国家视为"父权思维的制度化"而非阶级统治的产物，导致其陷入唯心主义路线——用抽象的伦理道德危机而非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

从1999年起，阿卜杜拉·奥贾兰所倡导的意识形态路线逐步偏离了上世纪80至90年代所奉行的武装对抗、反殖民主义及社会主义影响的轨道，转向不再与帝国主义体系对抗、反而顺应帝国主义重组政策的立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这种意识形态重构的最终制度化与政治宣言。尤其是"民主的解决方案"的说辞，旨在否认土耳其资产阶级国家的殖民结构，并剥夺库尔德人民的自卫权利；数百年来国家对库尔德人的系统性摧毁、同化、驱逐与压迫，被简化为单纯的"威权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偏差"，而国家的阶级属性则被彻

底抹去。由此，奥贾兰的意识形态体系未能对该结构进行阶级分析。土耳其国家没有被描述为用于压迫的殖民机器，反而被塑造成"可以商量的主体"——这既违背了马列毛主义的核心分析原则，也背离了库尔德人民的历史经验。

与政权进行谈判并未实质上改变土耳其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政策；但这种意识形态取向实际上剥夺了源于斗争的革命合法性，将和平从战术高度提升至战略高度，暴露了奥贾兰路线系统性反对阶级斗争与革命暴力的本质。此外，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并宣布停止武装斗争，意味着对土耳其国家所施加条件的接受和单方面执行。大会的最终公报向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和各政治党派发起呼吁，希望国家能承担起“历史性角色”——实则等同于承认现有殖民结构的合法性。奥贾兰对社会主义的反对绝非单纯的理论分歧，而是意味着革命斗争的意识形态基础的瓦解。他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斥为“旧世界的教条主义”，代之以“道德社会”、“自由个体”、“神话理性”等概念——由此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将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和文化观念置于核心地位。这种意识形态转变不仅是与社会主义传统的决裂，更是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尤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影响而形成的重新定位。

因此，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与《和平与民主社会呼吁》不仅是一份简单的妥协文件，更标志着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角度的革命路线彻底取消的路线。这种路线不仅为土耳其政府的现行政策提供合法性，更贬低了库尔德民族反殖民、反吞并的自卫斗争，将社会主义诋毁为"压迫性的历史残余"，并以拒绝国家解决方案为幌子，实质上否定了无产阶级国家作为被压迫者革命的过渡政权的必要性。若将此过程简化为库尔德人的内部争论，则低估了其客观意义：一个如库尔德工人党这样多年领导反帝、反吞并、反法西斯的革命斗争的运动竟采纳此种路线，其深远影响不仅关乎库尔德人民，更牵动着整个地区的运动。

从马列毛主义者的视角：取消进程的意义

库尔德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纲领以及奥贾兰的《和平与民主社会呼吁》，不仅标志着民族运动的组织转型，更意味着其从性质上的取消。这种取消直指革命武装斗争原则、基于独立的民族解放追求，以及被压迫民族对统治阶级的正当抵抗。奥贾兰路线不仅与库尔德运动历史彻底决裂，更代表资产阶级全球意识形态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革命理论发动了后现代主义、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多重冲击。

马列毛主义明确界定了革命的战略：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暴力、人民战争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强调：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不仅是防御性的，更旨在建立革命力量——尤其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这种战争不仅是武装阶段，更是对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政治和军事动员。奥贾兰的理论框架及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立场与上述普适的革命原则相悖："超越武装斗争"、"以和平解决为战略基础"、"无国家民主"、"自由个体"等主张，直接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马列毛主义革命战略。

这种观点将国家仅视为统治形式而非阶级工具，鼓吹"民主共识"以取代人民的有组织暴力行为。其结果是模糊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将斗争局限于改良主义范畴。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实践历史揭示了取消主义的反革命本质：列宁在他反对孟什维克的战斗中强调武装起义与革命组织的必要性，谴责和平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毛泽东批判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势力的"和平演变"，正是通过反对他们确立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基础。在此背景下，库尔德工人党将武装斗争视为"老掉牙的包袱"、将游击战定性为"负面的历史经验"

的行径绝非单纯战术调整——这是对社会主义准则的意识形态攻击。

这种决裂的另一面体现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从马列毛主义视角看，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主要敌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首先就是针对它的。而奥贾兰路线颠覆了这一前提，发展出了一种融入帝国主义地区重组计划的政治姿态。正如我们在罗贾瓦所看到的，与美帝国主义主导的联盟关系不只是战术性的，更构成了战略性依赖。由此，库尔德运动已从革命主体蜕变为帝国主义权力变化中的参与者。

这种在 1999 年后于奥贾兰范式中形成的取向，其哲学基础直接挑战了马列毛主义的核心原则：诸如"神话思维"、"道德社会"、"自由个体"、"无国家解决方案"等概念，可能表面看起来像激进创新，但实际上就是以文化改良取代阶级斗争，以个人良知替代群众运动，以服从体系的适应性取代革命性地突破敌围。

从马列毛主义视角看，革命运动的真正更新必须包含在保持意识形态核心原则与不放弃战略目标的前提下推进斗争的同时，根据新形势进行的战术性调整。然而，奥贾兰路线，彻底放弃了革命的战略目标，在意识形态上与帝国主义体系的所谓"文明化"改革项目相

呼应。其运作基于"革命不可能实现"的预设，优先通过顺应体系的变革而非依靠人民力量来推动转型。"无国家社会"、"非暴力解决方案"、"多元身份政治"等术语，都彰显了这种调和的改良主义倾向。

这种取消过程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也体现在其制度上。库尔德工人党终止武装斗争的决定，是伴随着其组织架构朝着体制内结构的全面重组。在这个旗帜下所提出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意味着重新回到将反对力量限制于议会框架内的国家认可的合法渠道和对自卫权的放弃。

马列毛主义将人民定义为革命性改变的核心主体——并不是由于其在文化上的或身份认同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人民是由阶级性质决定的、组织化的、武装了的和清醒的。相较之下，奥贾兰路线以文化维度界定人民，并主张通过"道德转型"实现解放。这种方法使人民去政治化，而且剥夺了其革命主体性。诸如"良知"、"道德"、"自治"等概念，以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取代阶级斗争。马列毛主义始终将反对取消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视为阶级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列宁对抗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战斗、毛泽东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易卜拉欣对修正主义的抗争，皆为历史

明证。必须将奥贾兰的路线理解为类似的取消主义过程，而马列毛主义对此的立场也必须是革命性回归与意识形态抵抗。

拒绝库尔德民族自决权

库尔德民族的自决权无论何时都是库尔德人民斗争的根本原则。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视角看，民族自决权是受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正当的与革命的基础。该权利不仅限于文化认同或地方自治——还包括必要时从原国家中分离并独立建国的权利。但奥贾兰路线与库尔德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方针，却彻底否定了这项基本权利。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无国家解决方案"、"共同祖国"、"民主国家"等说法推行同化政策——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转变，更是历史性投降的公开宣言。

列宁将民族自决权定义为被压迫民族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并强调剥夺此权将助长压迫民族的沙文主义并削弱革命团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者共同承认分离权。唯有所有民族获得自由，自由才可能实现——此权利不仅仅是理论命题，更是斗争的实践工具。库尔德民族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否认主义与同化主义政权的系统性压迫。在土

耳其，这种压迫通过对库尔德人的语言、身份认同、领地及社会组织结构进行全面摧毁的政策得以体现。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洛桑条约》和1924年宪法——库尔德民族在法律层面被否认存在，遭受物理压迫并在意识形态层面遭到妖魔化。

自1978年成立以来，库尔德工人党始终致力于对这些压迫体系的革命性抗争，旨在实现民族自决权与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社会主义库尔德斯坦的愿景。但1999年后，奥贾兰的思想路线偏离了这一根本立场：建国目标被讥为“对国家的迷恋”，库尔德人的自由诉求被描绘成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陷阱”，解放目标被重新定为了无国家的民主社会。尽管这些主张看似激进，但其实则构成了一条解构独立理念、迎合殖民体系的意识形态轨迹。无国家解决方案以进行殖民体制内的改造取代对殖民国家的推翻，将库尔德民族抗争降格为对地方性身份的改良。

在此语境下，“共同祖国”的叙事呼应了土耳其国家不可分割的意识形态命题。奥贾兰宣称库尔德人并非注定无国可依，反而可以通过无国家状态实现自由，这恰与土耳其官方将分离权定义为“战争原因”的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这不仅意味着对革命权利的否定，更是

对吞并与占领现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默认。库尔德民族解放斗争由此被去政治化为"争取改善身份认同的努力"，默许了未言明的国家主权。

奥贾兰路线放弃了库尔德民众与旧国分离的革命性权利，转而寻求基于与土耳其霸权合作的解决方案。其目标不仅是与土耳其国家和解，更在于获得帝国主义强权接纳，并成为全球体系中可以运作的参与者。诸如"无国家民主"、"多元主义"、"生态社会"等术语，恰与当代帝国主义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范式共鸣。他们并未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性批判，而是在其逻辑框架内提出"替代性治理模型"。

实质上这意味着放弃基于革命性群众暴力的斗争形式，转而投向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改良身份认同的政治及地方性民主相契合的运动。民族自决权的革命原则由此消解为后现代的"地方主义"，奥贾兰的理论用"自由个体"的道德改造取而代之。这剥夺了人民的集体性的，革命性的主体地位，并将斗争从历史性的阶级基础政治领域转移至伦理道德层面。从马列毛主义视角看，人民是通过阶级斗争决定自身命运的集体性主体——而分离正是该主体的国家表达。列宁指出："反对民族压迫最革命的斗争形式，就是公开捍卫被压迫民族的

分离权。"受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的革命者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库尔德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已公然宣告放弃组织和捍卫此权利。武装斗争的终止与解散表明该路线已沦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投降。大会声明中对土耳其议会的呼吁实质上承认了土耳其政权在库尔德地区统治的正当性；终结人民战争也意味着放弃自卫权。其理论与政治后果是将库尔德民族斗争纳入殖民国家的框架——这不是革命性的突破而是改良主义的妥协。这种做法符合帝国主义体系在该地区推行的"冲突解决策略"：通过控制地方行为体、将身份诉求与阶级属性分离、支持内部体制改革以实现控制。这正是奥贾兰所推崇的政治纲领。

正当化土耳其国家的吞并与占领结构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多民族地域之上，其本质是服务于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体系，更是强化土耳其民族统治的压迫机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库尔德人及其他民族身上。这种兼并性质并非外部特征，而是深植于其国家内部结构的构成要素：其法律、教育、行政体系，意识形态及集体记忆皆体现了此特征。因此，土耳其国家不只是库

尔德民族实现民族自决权的首要障碍，还是旨在系统性压制该权利的历史性阶级统治体制。

根据马列毛主义理论，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制度化其市场法则与阶级统治的构造。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过程并非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将奥斯曼帝国遗留的中央集权式的军国主义-苏丹化结构进行改造，使其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场改造始于对安纳托利亚的非穆斯林族群（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亚述人）的消灭，并且通过针对库尔德人的系统性政策以持续推进。从1925年的谢赫·赛义德起义、1937-38年的迪尔西姆屠杀、1980年政变，再到19世纪90年代的村庄毁灭行动——土耳其国家在每个阶段都动用武装暴力镇压库尔德人的反抗。

尽管如此，奥贾兰的路线与库尔德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仍否认或模糊土耳其国家的殖民本质。诸如"共同祖国"、"民主共识"等术语被诉诸于议会，而像国家的"可改造性"这种，则被用做意识形态工具来为兼并与占领领土的正当性背书。系统性镇压被包装成孤立的错误或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偏差，国家则被塑造成可以矫正的实体。奥贾兰宣称"国家具有可改造性"展现了其对阶级分析的刻意回避。尤其在土耳其，国家

正是统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军队、官僚、情报机构及警察——维系统治的工具。

库尔德民族正是该工具的直接压迫对象，其动用一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来压制库尔德民族的民族自决权。这种结构无法通过改良或修宪改变，唯有通过革命地决裂将其推翻。然而，奥贾兰，却依旧坚信改造国家的可能性存在。他通过呼吁一个"新宪法"、"民主自治"或"议会代表权"等主张，试图在现有体制内寻求解决方案。他那个所谓"议会具有历史性作用"的声明正是该路线的体现。这种做法背离革命内涵，终究还是会重复现存阶级关系的老路。

奥贾兰的路线体现了意识形态上的伪装，旨在将土耳其国家的否认、摧毁和同化政策归入"历史尘封的篇章"

这种合理化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洛桑条约》和 1924 年宪法的解读中。他虽然将二者称为否认库尔德人存在的根基，却将解决方案倒推至其形成之前——指向所谓"土库合作"，并怀旧式地援引共和国的建国原则。从马列毛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民族解放不是以压迫者的历史为基础，而是以该民族自己的抗争历史。洛桑条约与 1924 年宪法标志着对土耳其全体人民(包括库

尔德人)的殖民统治与全面压迫。援引这些历史来诉诸"共同祖国",实则是与库尔德民族抵抗的叙事划清界限。

奥贾兰对国家提出的核心主张之一,是需要克服"威权思维"。但这种评估掩盖了问题的阶级本质,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转变"的叙事具有还原论倾向——它试图通过心理、文化或个体因素来解释结构性国家暴力。然而土耳其国家并非恶意个体的产物或文化畸变的结果,而是阶级利益与融入帝国主义体系的直接产物。

这种合理化的形式同时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奥贾兰在"和平进程"与"对话"框架下与土耳其国家的关系,并没有体现对北约导向的国家结构的革命性对抗,而是一个适应该结构的政治任务。土耳其国家是北约的关键军事工具,也是帝国主义体系在中东的战略前哨。期待该国实现"民主转型"无异于向帝国主义示好——并自然地将民族解放斗争纳入其体系。

在罗贾瓦地区,这条路线的实际后果显而易见:在自治政府中回避与土耳其国家的直接对抗,建立与美国的战略联盟,以及推行"软性过渡模式",都反映出奥贾兰回避结构性冲突的倾向。聚焦于改革土耳其国家,

实质上是默许帝国主义的包围并延续资产阶级国家体制。这不仅损害库尔德人民，更扼杀了在土耳其自由斗争中所有的被压迫群体的希望。任何未能揭露国家殖民结构的"民主政治"诉求注定失败，并终将困守资产阶级框架。

向土耳其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者妥协

民族解放斗争不仅要对抗眼前的压迫国家，更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全球秩序。因此革命解放运动必须在意识形态层面明确反对任何试图在压迫国家的界限内解决冲突的妥协或改良策略。但库尔德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与奥贾兰的政治路线背离了这一原则立场，刻意构建出与土耳其统治阶级及帝国主义中心相容的政治定位。

这种体制不仅对库尔德人施加结构性暴力，对土耳其境内的工人阶级、农民与其他受压迫群体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它又融入北约和帝国主义欧盟的圈子，实质上成为了执行其地区战略的工具。奥贾兰将该体系重新定义为"民主共和国"，其本质是为了正当化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立场。这种立场并非推动对土耳其国家暴力机器的革命抗争，而是寻求其认可以参与"解决方案的进程"。

与帝国主义中心的关系正是这种适应性战略的又一明证。当美国，欧洲与北约谋求重构地区格局之际，奥贾兰路线非但没有抵制这个帝国主义体系，反而与其同流合污。在罗贾瓦地区，依托美国的军事-政治支持而建立起的自治模式，恰恰凸显了这种路线的非对抗本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战略调整，将这种适应帝国主义的策略延伸至土耳其境内。武装斗争的解散与终结是军事层面的体现；而诸如"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肩负历史使命"、"我们呼吁各政党、公民社会组织及舆论领袖支持该进程"等表态则是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体现。

此类呼吁阻碍了对土耳其国家结构本质及其资产阶级属性的革命性揭露，再次将其塑造成"可改变"、"可协商"的"合作伙伴"。从马列毛主义的视角来看，此类改良主义路线昭示着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尝试可能会瘫痪革命斗争。奥贾兰路线已实现这种可能：武装斗争的终止不仅是军事撤退，更意味着对阶级间战争的意识形态否定。奥贾兰拒绝从历史维度剖析资产阶级国家，偏好使用"威权思维""父权制原因""体系危机"等术语，实为进一步正当化统治。这种视角抹去了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将斗争从对抗资产阶级转化为个人道德与文化伦理，从而使其去政治化。

这种适应不仅旨在中和库尔德人的斗争，也是在削弱土耳其及中东地区的革命潜能。奥贾兰提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在巩固土耳其统治阶级及其国际靠山的统治。该方案以"无国家民主"、"基于身份认同的自治"和"民主邦联主义"等概念包装，并非反帝国主义的决裂，而是对帝国主义的统治的融入。

对库尔德民族抵抗正当性的歪曲

一个多世纪以来，库尔德人民已经抵抗了来自土耳其、阿拉伯、波斯等民族国家政权的殖民压迫。这场抵抗绝不仅仅是一系列的文化或民族诉求——它始终是革命性的自卫和为了抵御种族灭绝、同化政策、屠杀及民族否定而进行的生存抗争。在土耳其，这场斗争象征着对土耳其国家系统性灭绝政策与帝国主义强加的区域秩序的历史抗争。其正当性根植于对其殖民暴力的回应以及对被压迫者解放权利的普遍实现。

奥贾兰当前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库尔德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立的方针系统性地歪曲了这种正当性。他们用"暴力过激"、"冲突中心化范式"或"现实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等术语对这场斗争进行历史性谴责。库尔德人民的正当自卫的斗争被重新定义为"双方的错误"，这暴露了将殖民主义与抵抗运动画等号的自由主义意

识形态。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明确指出，这种中立立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画皮。

奥贾兰对库尔德抵抗运动的历史叙述剥离了其阶级内涵与革命意义，并将其简化为道德话语与伦理危机。抵抗者变成了"暴力分子"，而国家却变成了"可转变的角色"。这种简化框架使人民去政治化，使武卫失去正当性，并将斗争适合自由主义的语法。

19 世纪 80 年代，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运动标志着库尔德国家的主体性崭露头角。90 年代的"塞尔希尔丹（昂首）"阶段见证了农村库尔德人与贫困者们的政治反抗并唤醒了民族意识。然而奥贾兰在 1999 年后的论述中，并未将这一时期描绘为民众的解放运动，而是归咎于外部诱发的"暴力激进化"。这种论调与土耳其官话高度契合——后者长期将库尔德人的动员解读为"恐怖活动的升级"或"挑衅行为"。

从马列毛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在被殖民的或半殖民的统治条件下，人民的武装抵抗并非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列宁与毛泽东的理论遗产将革命暴力定义为组成部分的而非附属的力量。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对于被压迫人民无法依靠和平过渡时具有普适性——唯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建立政权。库尔德人的游

击式抗争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自卫实践。

但奥贾兰当前的意识形态却谴责武装斗争。他转而鼓吹"民主政治"、"和平方案"、"对话"和"道德社会"——这些主张摧毁了人民通过武装抵抗争取自由的理念。这并非战术调整，而是对人民的历史性革命在遗产意识形态层面的取消。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此方针制度化为其终止武装斗争、解散组织与"发展新斗争方式"的彻底背弃人民战争路线的宣言。

罗贾瓦地区昔日的游击力量已被与帝国主义势力结盟的专业化结构取代。群众参与被安全机构取代；革命的核心被迎合帝国主义中心的追求"稳定"所掩盖。奥贾兰所呼吁的"民主解决方案"实际上是一个敌视游击式抗争的意识形态方案，而其根基在于与资产阶级和解。该方案贬低库尔德人民的历史性成就——即其革命的主体地位——并将之污名化为"过去的包袱"，鼓吹所谓的抛弃过去。此举实质上切断了人民与自身力量及意志的联结。

正因如此，奥贾兰路线不仅是对武装斗争、游击战争或正当自卫的谴责——它更是一套歪曲库尔德人民的历史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建构。从马列毛主义者的视角

看，此类意识形态是对革命本质的系统性攻击。抵抗的正当性源于反殖民斗争，唯有通过革命手段才能维系这种正当性。

马列毛主义视角下的正当性与奥贾兰的意识形态攻击

根据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反抗不仅是受压迫者的权利，更是其历史使命。它要求对统治阶级，国家和基于压迫与剥削的帝国主义制度采取革命暴力。特别对于生活在被殖民条件下的人民而言，武装斗争并非是一种选择而是令其生存下去的条件。被压迫民族和沙文主义与剥削之间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列宁在《民族自决权》中强调，压迫民族的革命者必须公开捍卫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并积极支持他们的斗争。他在 1916 年的著作《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中，捍卫了武装反抗形式的正当性，并将其称为“革命战争”。毛泽东则通过人民战争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化发展。

因此，反抗不仅是一种形式——它是革命的实质。反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斗争的正当性，本质上与这些条件密切相关。这一理论遗产支撑着 20

世纪众多的革命运动武装抵抗的历史正当性——他们不仅将其视为工具，更视其为革命的构成要素，因为马列毛主义主张人民唯有通过人民的武器才能建立政权。

但奥贾兰的路线否定了这一革命遗产，并转而支持“非暴力解决方案”、“道德社会”、“民主协商”和“良心革命”等术语等表达出来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计划。这种做法将集体反抗权降格为个体道德转变，将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去政治化，并将革命暴力定性为“曾经的一个病态产物”。奥贾兰的意识形态并非抽象理论——这是个很具有后果的刻意政治抉择。

他提出的“民主解决方案”旨在与国家建立共识，将自卫行为定性为犯罪，并谴责革命的反抗。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结束武装斗争的制度化并非描述性的，而是规定性的。奥贾兰运用“现实社会主义的黥武效果”，“政权僵化”，“以安全为中心的政治”等术语批判人民战争——这些概念直接借鉴自西方自由主义与后现代话语——并将反抗重塑为一种文化斗争而非政治斗争。

这种方法在意识形态上与在帝国主义中心所涌现的冲突解决方法相一致。它不仅使反抗失去正当性，更将其重新定义为道德危机，模糊了压迫者的本质。从马

列毛主义视角看，这是对革命正当性的直接攻击——它不仅质疑反抗的形式，更否定其历史正当性，与殖民国家同流合污，并制造与人民的意识形态隔阂。奥贾兰对现有国家变革能力的信仰已演变为将群众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机器运作的计划，这与帝国主义"和平解决"的策略是完全兼容的。

奥贾兰的意识形态攻势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皆具毁灭性。宣扬"游击战争的时代结束了"绝非纸上谈兵——更是其战略部署。组织解散、放下武器与自我防卫的消解都破坏了反抗运动的基本准则，旨在将人民贬低为"道德个体"的社群。然而马列毛主义不仅将人民定义为一个道德层面的主体，更将其视为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所以抵抗斗争不可或缺。

奥贾兰的意识形态立场不仅反对过去的革命斗争，更否定了未来的革命潜力：他不信任人民自身的力量，转而寄希望于国家的民主化可能。从马列毛主义者的视角看，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投降与瓦解——人民被剥夺主体性并沦为文化的客体。正因如此，奥贾兰的意识形态攻势不仅危及库尔德工人党内部，更对地区性群众运动和革命战略构成威胁。

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

奥贾兰与库尔德工人党当前的意识形态取向不仅瓦解了库尔德斗争的革命基础，更将科学的与历史性的社会主义原则弃之不顾。这种思潮经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度化，并被嵌入后现代意识形态框架之中——通过"民主邦联主义"、"道德政治社会"、"民主性的现代化"等术语加以阐述——旨在削弱马列毛主义的核心部分。

奥贾兰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是以将国家与阶级斗争描绘为"旧范式"的过时元素为基础，主张国家是压迫、统治和战争的普遍根源，而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是遗毒。然而根据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压迫的，而是过渡性的：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借此终结资产阶级统治，并与群众共同建立政权的阶段。列宁设想在阶级消亡之后国家"自然消亡"；毛泽东则通过文化大革命展示了阶级斗争在进行过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中也继续进行着，表明了即使在社会主义之下阶级斗争也持续存在。

奥贾兰对国家的否定更多源于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和后现代无政府主义——将国家从阶级关系中抽象出来，将其解释为文化或父权制构造（"父权主导的原因"、"权威主义的思维"）。这种唯心主义未能认识到国家物

质性的阶级基础。对马列毛主义而言，只要阶级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或缺；唯有在无阶级社会中国家才能真正消亡。因此，奥贾兰的"无国家民主"体现了向社会主义逐渐过渡的幻觉——但对于马列毛主义而言，这代表着投降。

奥贾兰的意识形态框架通过否定阶级，物质关系与压制革命斗争以瓦解社会主义——即将其转化为与资本主义相容的道德偏好。奥贾兰"民主邦联主义"概念摒弃了集体计划经济，转而支持市场结构内的合作经济，离开了以价值理论、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范畴。

该意识形态拒绝阶级分析并通过将革命斗争降格为伦理道德问题以将其去政治化——这与反共的自由主义叙事中聚焦于官僚主义、国家精英或压迫性社会化的论调更加接近。奥贾兰采纳这些论调表明其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的反共话语趋同。其后果明确显现——举个例子，在罗贾瓦：尽管标榜社会主义，但私有制结构依然存在，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合作也正在发展，甚至以"人道主义干涉"和妇女权利为旗号，。

这些发展表明，奥贾兰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战略性地将他与对帝国主义的适应

的实在性对齐。从马列毛主义者的视角看，这种取向是对革命活力的消解：社会主义不再被理解为一个迈向无阶级社会的工程，而是一个无需推翻统治阶级就可以实现的制度。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存在就具有必要性——在缺乏实质性的革命过渡的前提下幻想没有国家的行为实属背叛。奥贾兰的“民主性的现代化”将社会主义简化为文化改良，完全葬送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前景。

这种意识形态转变必须被视为投降——不仅削弱了库尔德自由运动，更危及了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社会主义立场。因此，对抗奥贾兰的意识形态不仅需要政治论战，更需要对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历史正当性与革命主张进行有力的捍卫。

结论：意识形态杂耍和对清算进程的总体评估

从革命斗争的历史语境来看，库尔德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及阿卜杜拉·奥贾兰的《和平与民主社会呼吁》绝非单纯的战术调整或结构重组，而是他们进行全面的意识形态取消进程的宣告、制度化与国际的校准——矛头直指库尔德解放运动与在土耳其的宽广的革命运动。从马列毛主义者的立场看，这不仅是一个

组织性决策——更是对革命路线与人民战争的直接否定，同时也是一次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攻击。

奥贾兰的路线旨在实现三重取消：否定民族解放、去正当化革命暴力与对科学社会主义攻击。它将库尔德人的民族自决权污蔑为"民族主义执念"和"对国家念念不忘"，实质上将民族解放斗争——马列毛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定性为犯罪行为，并主张放弃推翻殖民国家，转而寻求与现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这种论调为土耳其资产阶级殖民国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否定与破坏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据此，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终止武装斗争并解散组织——这实质上是对革命性的群众抵抗与游击路线的背弃。诸如"暴力升级"，"冲突中心化范式"，"道德革命"等术语被用来剥夺抵抗的正当性，而取而代之的是和平主义与无条件投降。人民自卫的正当性被描绘成过去的"病态"，而革命战争路线则被谴责为错误。这种双重取消通过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得以完成：奥贾兰谴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黠武和不道德的，并用抽象的自由主义话语加以反驳："民主性的现代化"、"无国家民主"和"道德政治社会"。这些概念剥离了社会主义以阶级为基础的、

集体主义的和革命的本质，代之以符合资本主义秩序的文化偏好。这种三重意识形态转型并非偶然——而是精心策划的结果。

奥贾兰的路线不仅是库尔德工人党内部的转型，更是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重组战略相契合的战略性政治重定位。诸如"民主国家"，"民主邦联主义"，"社群经济"等术语，已演变为可以与西方软实力战略、白左思潮及帝国主义议程相兼容的口号——这表明奥贾兰的路线并非替代方案，而是这些战略的整合工具。

该路线在意识形态层面更使土耳其国家的压迫机制获得正当性。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论述构建出一个这样的意识形态框架：将库尔德人民的抗争与土耳其国家的系统性暴力描绘为对称冲突——从而掩盖了种族灭绝、占领、同化与经济封锁的真相。这种言论否定了人民的自卫权利。此类否定不仅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内部转向，更象征着自由主义对被压迫民族正当抗争的普遍涵摄。

奥贾兰的意识形态环境将历史性的人民抗争溶解于自由主义的和解乌托邦，撤销了革命性决裂，用文化多样性取代阶级冲突。这种导向不仅是土耳其和库尔德地区，更是全世界的革命运动的战略性转折点：它通

过贴上"暴力", "极权"或"不道德"的标签, 将所有倡导革命性决裂的运动边缘化。从国家层面看, 库尔德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是安抚土耳其政府与北约中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举措;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 则是对社会主义遗产的后现代性贬低。库尔德工人党的自我解散不仅是一个组织的终结——更是将库尔德革命斗争五十年来的历史敞开于自由主义的整合进程面前。

对于马列毛主义力量而言, 这一情境既是历史警钟, 也是行动的战略号召。库尔德工人党的瓦解所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绝不能被帝国主义或国家主导的改良主义填补——必须用焕然一新的革命觉悟与之对抗。清算所暴露出的意识形态真空, 也恰好为以阶级斗争为基础、以人民战争为导向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复兴提供了战略契机。

因此, 任务明确了: 必须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群众革命性反抗的正当性、人民战争的有效性, 以及被压迫民族争取革命解放的权利。奥贾兰路线企图倒转历史巨轮并将革命诉求束缚在自由主义的谈判桌之上。我们的回应必须是抵御而非投降; 革命而非改良; 马列毛主义的明确而非意识形态的歪曲。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

2025 年 10 月